

弱者何以能胜？

杨少华

内容提要 在国际冲突中,弱者为何能战胜强者?二战后的国际冲突中,为什么弱者战胜强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本文通过对利益对称性、民主政体、外来援助和战略类型这四个解释变量的检验后认为,弱者对战略类型的选择是最有解释力的因素。在当代国际冲突中,弱者战胜强者的关键是对不对称冲突战略的采用。弱者采用不对称战略的直接目标,不是在军事上战胜对手,而是通过使冲突长期化,扩大暴力使用的范围,给强者造成难以承受的成本,从而消磨其继续战斗的政治意志,迫使强者最终从政治上放弃战争。论文的讨论有助于深化对当前实力不对称冲突包括反恐战争的认识。

关键词 国际冲突 不对称冲突战略

在世界战争史上,虽然以强胜弱、以多胜少是常见现象,但人们也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牧羊人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战例,例如西班牙人民反对拿破仑占领军的游击战争、美国独立战争、南斯拉夫游击队反抗纳粹法西斯的

《国际政治科学》2008/3(总第15期),第1—35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越南反美战争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统计数据表明,在二战后的全球武装冲突中,不对称冲突占大多数,而这在这些不对称冲突中,弱者战胜强者(或者说强者未能战胜弱者)又占了大多数。全球武装冲突及其结果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大因素,因此对不对称冲突中弱者为什么能够战胜强者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力、动机和战略的解释视角

要解释弱者战胜强者的现象,首先需要不对称冲突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在本文中,“不对称冲突”指的是“物质实力相差悬殊的行为体之间的跨国武装对抗”。其确定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看冲突方的物质实力是否相差悬殊,二是看这种冲突是否跨越国界。与“不对称冲突”的定义相适应,拥有优势战争资源的一方为“强者”,相反则为“弱者”。这就存在着强弱之间的比例问题。所谓双方实力“悬殊”,在本文中是指强弱双方的实力对比应达到 5:1 或者更多。至于“胜负”,则是看行为体在冲突结束时是否基本实现了发动冲突的政治目的,如果实现了就是胜利,相反则为失败。如果强者没有实现其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那么即使他们在战场上没有落败,按照本文的标准也应算作失败。

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对“不对称冲突”的研究还不多。已有的学术研究成

在这里,物质实力具体指冲突伊始双方的人口与武装力量的平均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指标都不可能完全反映实力差距。关于如何对物质实力进行定量测量,可以参见 John Jacob Nutter, “Unpacking Threat: A Conceptual and Formal Analysis,” in Norman A. Graham, ed., *Seeking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Military Spending and Arms Transfer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p. 29—49。

具体参见杨少华:《不对称冲突研究述评》,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37—138页。

果主要见之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学术界，具体包括实力、动机和战略等解释视角。

(一) 实力视角

聚焦于实力因素的学者基本上是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行为体之间关键的差别是他们所拥有的“相对实力”，国际冲突的最终裁判者是以军事实力定义的权力，相对权力大的行为体将会获胜，而相对权力小的行为体终将失败。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实力弱者战胜实力强者是难以置信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不以“为什么弱者能战胜强者”的方式来提问。在他们看来，如果弱者胜利了，那肯定是因为弱者克服了军事实力的劣势，因而不是弱者了。所以，现实主义者的问题变成：原本实力处于劣势的行为体如何转而具有实力优势？

遵循这样的思路，现实主义者提出了几种相应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权力转移理论”。虽然吉尔平的权力转移理论并不直接针对不对称冲突，但其结论也适用于解释“以弱胜强”现象。吉尔平认为，霸权国的扩张达到历史顶点以后必然面临边际收益

其中最主要的学者及其著作参见 T. V. Paul, *Asymmetric Conflicts: War Initiation by Weaker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Gilmer,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ilures of France in Algeria, Israel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除了专著以外，相关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也发表了许多，例如 Frans Osinga, “Asymmetric Warfare: Rediscovering the Essence of Strategy,” in John Andreas Olson, ed., *Asymmetric Warfare* (Oslo: The Royal Norwegian Air Force Academy, 2002), pp. 267—318; David L. Grange, “Asymmetric Warfare: Old Method, New Concern,” *National Strategy Forum Review*, Winter 2000, http://blackboard.jfsc.ndu.edu/html/jfscPublications/assets/docs/cam_grange.pdf; Ike Skelton, “America’s Frontier Wars: Lessons for Asymmetric Conflicts,” *Military Review*, Sep/Oct 2001, Vol 81, Issue 5, p. 22; N Seminar, “Asymmetric Warfare: The Only Thing New Is the Tactics,” 2000, <http://www.ndu.edu/library/n2/n005605n.pdf>; Kenneth F. McKenzie Jr., “The Revenge of the Melians: Asymmetric Threats and the Next QDR,”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0,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ndu/mcnair62.pdf>

实力对国家来说意味着许多积极的结果，它可以对他国的侵害进行威慑，迫使他国进行妥协，或者在战争中将对手击败。参见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Chapters 1—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188—192。

递减的约束。随着帝国控制范围的日益扩张,其维护帝国统治秩序的成本也日益沉重,最终导致帝国的逐渐衰败。从这一逻辑出发,不难得出的推论是,随着帝国的逐渐衰败,其控制的广阔领土上逐步出现众多的反抗与挑战,最终导致某些区域出现了有利于原本处于劣势行为体的权力对比状态。

第二种解释是以美国军方学者杰弗里·内科德(Jeffrey Record)为代表的“外援论”。内科德指出,从历史案例看,弱势一方取得胜利的重大不对称冲突中,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外部的援助。这种外来援助可以削弱甚至消除冲突双方在军事战场上的物质实力不对称,从而导致弱者取得冲突的胜利。

第三种解释是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技术扩散论”。这种观点认为,二战后西方殖民主义的失败应归结于“欧洲白人相对于亚非有色人种的技术、经济与军事优势的丧失”,而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正是“欧洲得以征服和维持其世界统治的基础”。

现实主义的观点能够解释历史上相当多的冲突结果,其中也包括很多不对称冲突的结局。根据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的统计,在1800—2003年期间,强者在所有不对称冲突中获胜的比例占71.5%。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主义的逻辑是一致的。不过,现实主义显然不能解释全部的冲突结果,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许多案例。例如,英国1946—1948年对巴勒斯坦的镇压,法国1954—1962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色列1982—1985年对黎巴嫩的入侵,以及冷战期间两大超级强国分别在越南和阿富汗的失败。在这些案例中,强势的一方毫无疑问地自始至终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但其结果却无一例外地违背了“强胜弱败”的现实主义“铁律”。

(二) 动机视角

与强调物质实力的学者相反,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探究不对称冲突中普遍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Jeffrey Record, “Why the Strong Lose?” *Parameters*, Vol. 35, Winter 2005/06, pp. 16—31.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78), chapters 11—12.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

存在的冲突“动机”不对称来进行解释。这方面最代表性的人物是安德鲁·迈克 (Andrew Mack)。通过考察一系列大国军事干涉失败的案例,迈克指出:“在这些案例中,暴乱组织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其战场上的军事胜利……而是来自于其对对手发动战争的政治能力的不断损耗。”他还进一步论证说,由于强国的生存不会受到弱势一方的威胁,全面动员其军事实力在政治上是无法实现的;随着战场伤亡和经济损失的不断上升,来自国内的批评也不可避免地增加。对于弱势一方来说,由于感受到外来强权对其生存的威胁,原本有利益矛盾的各个团体会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从而具有更为强烈的获胜动机并愿意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简言之,迈克的理论逻辑是:“相对实力”决定了“相对利益”,而相对利益则导致双方“政治脆弱性”的不同,这种政治脆弱性可能导致强国的失败。

除迈克以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例如,史蒂文·罗森 (Steven Rosen)指出,保持对战争代价的忍受性对赢得战争十分重要。处于弱势的一方可以通过显示忍受伤害的强大意志来抵消对方在军事上的优势。吉尔·米洛姆 (Gil Merom)认为,在不对称冲突中,专制政体的国家很少会失败(即使有也肯定是因为实力不济);而民主政体的国家则不同,由于现代民主体制赋予了社会干预国家的权力,富有政治能量的中产阶级所坚持的道德标准会导致民主国家对野蛮战争政策和己方战争伤亡的极度敏感,从而大大降低其战争忍受力。

对动机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们的思维视角,其对不对称冲突的结果也的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不过其缺点不容忽视。首先,由于难以直接观察,“相对动机”的测量和比较往往十分困难。尽管动机的不对称常常被人们当成“万金油”来解释几乎所有物质实力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但如果没有对相对动机的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 27, No. 2, 1975, pp. 175—200.

Ibid., p. 175.

Ibid., pp. 195—200.

Steven Rosen, "War Power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uffer," in John Vasquez and Marie Henahan e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eace and War*, 1999, chapter 11.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ilures of France in Algeria, Israel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准确度量,大国就很难知道究竟在什么时候干涉能够成功,什么时候应该断然撤军。其次,虽然强势一方的动机往往弱于弱势一方,但强势一方几乎总能给对方造成更为巨大的损失,它本身所遭受的损失一般则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仅仅考虑动机差异,而不考虑代价差异,并不足以对不对称冲突的结果给出可靠的判断。再者,认为强势的民主国家是因为缺乏动机而失败的观点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比如,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强大的“专制国家”也会在不对称冲突中落败(纳粹德国在南斯拉夫和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而且,民主国家更脆弱、更仁慈的说法也不一定符合事实(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都伤亡惨重但仍然长期坚持,而且其残暴程度甚至远甚于其他所谓的专制国家)。因此,国家政体与战争胜利未必存在着相关关系。

(三) 战略视角

除了实力和动机这两个视角外,也有一些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战略(主要是军事战略),即运用军事力量的方式。这些研究大都认为,战略有优劣之分,冲突双方的战略选择以及他们之间的战略互动决定了“优势能否转化成胜势”。

在这类研究中,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 2001和2005年的著述最具代表性。托夫特把战略分为“直接战略”和“间接战略”两种。“直接战略”又分为常规进攻和常规防御两种,其目标是通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破坏对方的战斗能力。“间接战略”则分为野蛮战略和游击战略两种,其目标是通过作战给对方造成足够大的持续损失以打击对方的战争意志。通过对1800—2003年不对称冲突案例的数量统计,托夫特归纳出战略选择与冲突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如果冲突双方属于相同类型的战略互动(直接—直接、间接—间接),那么强者将获胜;如果双方属于相反类型的战略互动(直接—间接、间接—直接),那么弱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阅 Michael C. Desch, “Democracy and Victory: Why Regime Type Hardl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2, 2002, pp. 5—47.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1, 2001;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者将获胜。

托夫特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战略互动”的考察,将“时间”因素引入人们的认识视野。托夫特认为,在战略互动中最关键的因果机制是时间,如果双方采取相同的战略,那么弱者将无法抵制强者的军事优势,强者可以赢得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与此相反,如果双方采取相反的战略,那么强者的权力优势将受到弱者战略的削弱,从而导致战争过程的延长。在这里,时间对双方的作用恰好相反:时间越长,对强者越不利,对弱者越有利。当战略互动导致实现军事或政治目标的过程意外地延长时,强者在不对称冲突中具有落败的倾向。从托夫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的解释逻辑,即不同类型的战略互动导致不对称冲突时间的延长,从而提高了弱者战胜强者的可能性。

不过,托夫特的战略互动解释仍然留下了几点重要的疑问。首先,有关强者以间接的“野蛮战略”应对弱者间接的“游击战略”的论述是自相矛盾的。按照托夫特的模型,强者要想在应对游击战略中取胜只能采用野蛮战略,但他又强调说,现实中的野蛮战略几乎总是适得其反(比如激起对方的反抗意愿或是引起国际干预等)。这实际上意味着,当代游击战是不可战胜的,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其次,在其理论模型中,托夫特将研究任务限定于考察不同的战略互动对冲突结果的影响,从而有意回避了战略选择的问题。如果说总是存在着一种最优的战略选择,为什么失败了冲突行为体不去采用它呢?即便弱者因为训练、技术和实力的限制而无法自由选择,但实力更为强大的国家为何不改变原先并不奏效的战略呢?托夫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仍然将此排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3—48.

Ibid., p. 34.

Ibid., p. 35.

参阅 Ivan Arreguín-Toft, “The Futility of Barbarism: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Systematic Harm of Non-combatants in War”, 2003, http://www.ksg.harvard.edu/wapp/research/working/ivan_toft.pdf

参阅 J. Bowyer Bell, *The Myth of the Guerrilla: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Malpractice* (Hardcover: Knopf, 1971); 理查德·戈特:《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除在其研究任务之外,而只是将行为体的战略选择视为给定的事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托夫特关于“时间有利于弱者而不利于强者”的逻辑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以弱胜强的不对称冲突现在基本上是“持久战”,时间的确是解释这种反常现象的重要因素。但时间也可能有利于强者,历史上也不乏强者经过长年坚持而取胜的案例。在笔者看来,仅仅认为“时间有利于弱者而不利于强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引入“成本”概念,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弱者采用的某些战略(主要是不对称战略)为何能够削弱强者的战争意志,从而导致其对战争的放弃?

总体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解释主要遵循了两种思路:第一,就某一具体时间和地域而言,双方实际用于冲突的物质实力对比出现逆转,从而导致以弱胜强的现象。第二,扩展实力的外延,使之不仅包括武器装备、钢铁产量、国民生产总值等“硬”的方面,而且也包括动机、决心、制度、文化等“软”的内容。倘若物质意义上的弱者在动机决心和冲突战略上占有很大优势,就可以使自己在总体权力上超出在物质上占优势的对手,从而变成强者(至少不再是弱者)。总的来说,这两种思路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客观上仍然遵从了“强胜弱败”的理论公设,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

本文认为,仅仅对实力概念进行扩充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一般而言,行为体能否实现政治目标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相对于对方而言,己方拥有多少可以立即使用的或者潜在的资源;第二,为了达成自己的军事或政治目标,应当如何来运用这些资源。前一种因素在不对称冲突中大致上是既定的(否则就将不符合本文关于不对称冲突的定义)。这样一来,后一类因素就成为影响不对称冲突结果的主要变量。这种因素即所谓

托夫特并未讨论为什么行为体会选择某种战略,同时也不打算解释为什么在冲突过程中一些行为体改变了战略而另一些没有。相反,托夫特将行为体的战略选择视为给定的事实,而主要考察不同的战略互动对冲突结果的影响。参见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p. 36.

比如,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就是通过持久的蚕食战略最终取胜的,后来又耗费多年镇压了1948—1957年的马来亚人民反英起义。参阅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501页。

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战略”是“调动一切力量和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学”。因此,对不对称冲突的考察不仅要问“弱方有哪些力量可以利用”,更为关键地还在于“这些力量如何使用?”

据此,笔者提出的理论假设是,弱者采取的战略类型决定了不对称冲突的结果。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将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对1945—2007年期间的不对称冲突的样本进行统计,根据统计结果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以美伊战争(2003—2007)为案例来对假设进行验证。本文还将对“不对称战略”与“弱者战胜强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二、当代的不对称冲突

根据本文关于不对称冲突的定义以及对实力差距设定的标准,双方物质实力相差小于5:1的冲突不属于不对称冲突,内战也被排斥在不对称冲突之外。此外,本文以二战以来的不对称冲突作为考察范围。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大致遴选出36场不对称冲突的案例(见表-1)。在这些冲突中,弱者取胜的比例达到了一半以上,这是在此前不曾出现过的现象。为什么在实力悬殊的冲突中,强者反而难以取胜呢?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安德鲁·迈克(Andrew Mack)的“利益不对称”理论;吉尔·米洛姆(Gil Merom)的“民主政体”理论;杰弗里·内科德(Jeffrey Record)的“外援”理论;和伊万·阿累吉—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的“战略互动”理论。他们的主要

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不同的不对称冲突往往分为不同的时期或阶段,而且发生冲突的参与方往往也可能不止两方,并且随着冲突的进行有所变化。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假定参与不对称冲突的行为体为主要的两个冲突方。如果冲突分为不同的阶段并因而具有不同的特征,本文将以最重要的阶段作为考察对象。

按照托夫特对近两百年不对称冲突的统计结果,在1800—1849年间,弱者赢得了大约11.82%的不对称冲突;到1850—1899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20.5%;到1900—1949年间又上升到了34.9%;而到1950—1999年间甚至超过一半达到了55%。参见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pp. 175—200;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Jeffrey Record, “Why the Strong Lose?” pp. 16—31;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解释变量分别是利益对称性、民主政体、外来援助和战略类型。以下我们将对这些变量的解释力进行统计检验。

(一) 对四种理论假设的统计检验

本文将以 1945—2007 年期间发生的 36 场不对称冲突为数据,对这些理论假设进行验证。根据前述四种理论,本文将冲突双方是否存在利益不对称,强者是否是民主政体,弱者是否获得重大外援,以及弱者是否采取了不对称战略作为四个可能的自变量,而把不对称冲突的结果作为因变量。

关于不对称冲突双方是否存在利益不对称,本文主要考察冲突是否关系到弱者的核心利益。之所以采取这种判定标准,主要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构特征有关。按照李少军关于国家利益的层次划分,有些利益属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些“生死攸关的利益”,任何国家都会不顾一切地加以维护。而其他的利益则相对比较模糊,也不会导致国家不惜代价以战争手段来加以维护。由于当代典型的不对称冲突通常是外来强国的军队在弱小国家的国土上与弱小国家的政府或非国家组织进行武装冲突,实力较弱的一方客观上无法对强者的核心利益形成威胁。因此,我们在判定冲突是否存在利益不对称时主要看这场冲突是否关乎弱者的核心利益,而这种核心利益具体指冲突的结果是否会导致弱者赢得或大量丧失主权和领土。

至于不对称冲突中的弱者是否得到重大的外来援助,这一变量则从弱者是否得到外援来判断。如果弱者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外来援助,那么对其判定自然没有异议。难点在于在弱者得到某种外援的情况下如何判定其重要程度。为此,本文首先从物质力量方面来加以判定,也就是说,仅仅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或同情并不能视为得到重大外援;其次看弱者所得到的外来援助是否达到了改变冲突双方原本悬殊的实力对比——即使不能使弱者的实力超过强者的实力,至少也能使他们在战场上的物质实力大致均衡。在实际判定中,我们将弱国受到另一大国(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世界主要大国)的公开援助视为得到重大外援,否则视为没有得到重大外援。

李少军:《论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4—9页。

尽管“民主和平论”早已为学术界所熟悉,但要判定一国是否属于民主政体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形式上讲,只要该国建立了某种类型的民主政体,我们一般可以将之视为民主政体国家。另一方面,我们还得从民主政体的实质方面来进行把握。不管是从“民主和平论”还是从米洛姆的“民主政体论”的理论逻辑来看,他们突出强调的是国家内部的普通民众能够通过某种政治制度的安排来影响或决定国家的战争政策。因此,如果在不对称冲突爆发、发展和结束等问题上,普通民众的意愿能够产生重大的支配性影响,那么我们就将该国视为民主国家,否则就视为非民主国家。

最后一个自变量是战略类型。由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学习效应,弱者选择直接战略来应对强国近乎绝迹,至少不能算是理性的战略选择。不对称冲突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弱者往往都选择实施“不对称战略”,即是选择了托夫特所说的游击战略。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一种新的不对称战略——恐怖主义——也日渐成为冲突的重要形式,这在全球反恐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对战略类型的判定主要是看弱者是否主要使用了不对称战略(具体是指游击战略或恐怖袭击),以此来考察不对称战略类型与不对称冲突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1945—2007年间不对称冲突的相关数据详见表-1。

表-1 当代不对称冲突情况概览(1945—2007)

序号	冲突名称	主要冲突双方	起止时间	是否关乎弱者核心利益	强者是否民主政体	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	弱者是否采用游击战略	冲突结果(强者)
1	印度支那抗法战争	越南—法国	1945.9—1954.7	是	是	是	是	败/平
2	马达加斯加起义	马达加斯加—法国	1947.3—1948	是	是	否	否	胜
3	印尼人民抗荷斗争	印尼—荷兰	1947.7—1949.1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4	马来亚人民反英起义	马来亚—英国	1948.6—1957.8	是	是	否	是	胜

康德著:《历史理论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06—107页;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p. 15.

(续表)

序号	冲突名称	主要冲突双方	起止时间	是否关乎弱者核心利益	强者是否民主政体	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	弱者是否采用游击战略	冲突结果(强者)
5	突尼斯反法独立战争	突尼斯—法国	1952.1—1956.3	是	是	否	是	败/平
6	肯尼亚反英武装斗争	肯尼亚—英国	1952.10—1963.12	是	是	否	是	胜
7	圣多美岛反葡暴动	圣多美—葡萄牙	1953—1953	是	是	否	否	胜
8	摩洛哥反法武装斗争	摩洛哥—法国	1954.8—1956.3	是	是	否	是	败/平
9	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	阿尔及利亚—法国	1954.11—1962.3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0	塞浦路斯独立战争	塞浦路斯—英国	1955.4—1960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1	阿曼反英武装斗争	阿曼—英国	1955.12—1960	是	是	否	是	胜
12	喀麦隆反法武装斗争	喀麦隆—法国	1956.7—1960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3	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苏联	1956.10—1956.11	是	否	否	否	胜
14	刚果(金)反帝斗争	刚果(金)—比利时	1960.7—1964.1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5	安哥拉反葡独立战争	安哥拉—葡萄牙	1961.2—1975.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6	越南战争	越南—美国	1961.5—1975.4	是	是	是	是	败/平
17	几内亚比绍独立战争	几内亚比绍—葡萄牙	1963.1—1974.8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8	南也门反英武装斗争	南也门—英国	1963.10—1967.1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19	莫桑比克民族独立战争	莫桑比克—葡萄牙	1964.9—1974.9	是	是	否	是	败/平

(续表)

序号	冲突名称	主要冲突双方	起止时间	是否关乎弱者核心利益	强者是否民主政体	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	弱者是否采用游击战略	冲突结果(强者)
20	津巴布韦反英武装斗争	津巴布韦—英国	1969. 4—1979. 12	是	是	否	是	败/平
21	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	柬埔寨—美国	1970. 4—1975. 4	是	是	是	是	败/平
22	土耳其干涉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土耳其	1974. 7—1974. 8	是	是	否	否	胜
23	印尼侵占东帝汶	东帝汶—印尼	1975. 10—1976. 7	是	是	否	否	胜
24	西撒哈拉战争	西撒人阵—摩洛哥	1975. 11—1983. 6	是	否	否	是	败/平
25	欧加登战争	索马里—埃塞俄比亚	1977. 7—1978. 3	是	否	否	否	胜
26	中越边境战争	越南—中国	1979. 2—1979. 3	否	是	否	否	胜
27	苏联入侵阿富汗	阿富汗—苏联	1979. 12—1989. 2	是	否	是	是	败/平
28	美军入侵格林纳达	格林纳达—美国	1983. 10—1983. 12	是	是	否	否	胜
29	美军入侵巴拿马	巴拿马—美国	1989. 12—1990. 2	是	是	否	否	胜
30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科威特—伊拉克	1990. 8—1990. 8	是	否	否	否	胜
31	海湾战争	伊拉克—美国	1991. 1—1991. 2	否	是	否	否	胜
32	索马里维和冲突	索马里—美国	1993. 4—1993. 11	是	是	否	是	败/平
33	北约空袭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美国	1999. 3—1999. 6	是	是	否	否	胜

(续表)

序号	冲突名称	主要冲突双方	起止时间	是否关乎弱者核心利益	强者是否民主政体	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	弱者是否采用游击战略	冲突结果(强者)
34	阿富汗反恐战争	阿富汗—美国	2001. 10—	是	是	否	是	败/平
35	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美国	2003. 3—	是	是	否	是	败/平
36	黎以冲突	黎巴嫩—以色列	2006. 7— 2006. 8	是	是	否	是	败/平

资料来源：参考斯莫尔 (Melvin Small) 和辛格 (J. David Singer) 的“战争相关数据库” (Correlates of War)、托夫特的战略互动与结果数据库 (1816—2003) 以及李巨廉的 1945—1999 年主要的武装冲突和战争数据库自行绘制。参见 Melvin Small and J. David Singer, *Resort to Arms: International and Civil Wars, 1816—1980*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3);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28—232; 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0—401 页。

从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不对称冲突结果关系到弱者的核心利益时，以弱胜强的比例为 63.9%；在强者属于民主政体的情况下，以弱胜强的比例为 61.1%；当弱者得到重大外援时，以弱胜强的比例为 50%；而当弱者主要采用了不对称战略时，以弱胜强的比例高达 91.7%。总体来看，外援与冲突结果的相关度最低，弱者即使没有得到重大外援，强者获胜也仅为 43.8%，而战略类型与冲突结果的相关度最高，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弱者是否采用不对称战略是决定不对称冲突结果的最重要原因。

(二) 对战略因素的加控检验

接下来本文还将通过对其他三种因素进行变量控制来集中考察不对称战

阿富汗反恐战争自 2001 年开始以来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从阿富汗国内的当前形势、打击恐怖主义的效果以及国际评论界的评述来看，本文认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是失败的。也可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1/31/content_7529686.htm。

伊拉克战争同样是一场远没有结束的战争，尽管战争的初期美军进展顺利，但其后期一直深陷暴力泥潭，连布什本人也曾公开表示这场战争没有获胜。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21/content_5514572.htm。

略与冲突结果之间的相关关系。当然,这种考察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没有影响或者不够重要,而只是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暂时忽略它们。为此,本文选择除战略因素以外,其他自变量取值相同的案例进行研究。

如表-1中的数据所显示的,当代不对称冲突最典型的情况是:一个优势的外来军事部队(由单一国家的部队组成或以多国联军的方式组成)在他国的领土上对抗一个居于劣势的国家或是当地的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结果通常都会关系到弱者的核心利益,因此,本文将自变量“利益不对称”的值假定为“是”;由于参与当代不对称冲突的大国乃至强国一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因此,本文将自变量“民主政体”的值也假定为“是”;最后从总的情况来看,在当代的不对称冲突中弱者受到外来大国重大援助的情况较少,因此本文将自变量“重大外援”的值也假定为“否”。以此为标准,本文排除了不符合以上条件的10场不对称冲突,它们分别是:印度支那抗法战争、匈牙利事件、越南战争、柬埔寨抗美救国战争、西撒哈拉战争、欧加登战争、中越边境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剩下的案例样本共为26例,占该时期全部样本的72.2%。

从这26个案例所显示的情况来看,其他3个变量(是否关乎弱者核心利益、强者是否为民主政体、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的取值完全是一致的,这有利于我们集中地对战略类型变量进行考察。详细的情况见表-2:

表-2 变量控制后的不对称冲突统计检验结果

弱者是否采用不对称战略	强者取胜	弱者取胜/平	检验结果(总比例)
是	15.8% (3)	84.2% (16)	88.5% (23)
否	100% (7)	0% (0)	

从这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完全一致的26场当代不对称冲突中,弱者采用不对称战略(主要是游击战略与恐怖袭击)取胜的比例高达88.5%。

事实上,即使不人为地将前述10场不符合标准的不对称冲突排除在外,通过使用SPSS软件对二战后的全部36场不对称冲突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我们仍能发现“弱者是否主要采用不对称战略”与“以弱胜强的冲突结果”之间有着较高的相关性。具体检验结果,参见表-3。

表-3 当代不对称冲突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标准回归系数 (Beta)	t	显著性水平 (Sig)
回归常数 (Constant)		0.158	0.876
弱者是否使用不对称战略 (X ₁)	0.822	7.357	0.000
是否关系到弱者的核心利益 (X ₂)	-0.006	-0.052	0.959
强者是否是民主政体 (X ₃)	-0.028	-0.269	0.790
弱者是否得到重大外援 (X ₄)	0.091	0.890	0.380

说明:自变量为 X,因变量为 Y(不对称冲突结果); $Y = 0.822X_1 - 0.006X_2 - 0.028X_3 + 0.091X_4$; Adjusted R Square = 0.672。

从上表可见,在“弱者是否使用不对称战略”与“不对称冲突结果”的关系中,标准回归系数为 0.822,显著性水平为 0.000,这说明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

根据以上加控检验,本文认为,采取不对称战略与以弱胜强现象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在当代条件下,如果弱者主要采取不对称战略,那么弱者很可能会取得不对称冲突的胜利;而如果弱者没有采取不对称战略,那么强者更有可能取得不对称冲突的胜利。

三、战略致胜的基本逻辑

统计分析表明,弱者战略选择与冲突结果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更重要的是要对两者之间联系机制进行说明,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深化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本文将主要沿用目前学术界和政论界所广泛使用的“不对称战略”及其对偶概念“对称战略”进行论述。

(一) 冲突双方的互动逻辑

具体而言,“对称战略”是指使用己方的正规军队,通过一场或数场决定性的会战击败或消灭敌方的正规军队,控制对方的人口、土地、城市、重要工业或商业中心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对称战略最常见的形式是,进攻方军队前往攻占对方的重要战略价值目标(通常是首都、工业中心、交通枢纽、重要桥梁或要塞

等),而防御方则奋起反抗,进行一场或一系列的常规战斗,直到其中的一方认输为止。对称战略以对方的武装力量为直接对象,目标是通过破坏或剥夺对方进行战斗的物质能力来使其意志归于无效,其特征是冲突双方在共同的行动规则和对胜负的共有理解下进行军队对军队的较量。

不对称总是相对于对称来讲的,本文中的“不对称战略”同样必须在“对称战略”的基础上进行界定。一般来说,“不对称战略”是指区别于对称战略(通常指常规作战)的其他所有战争方式,在当代具体是指游击战略和恐怖战略。与对称战略不同,这种方式通常并不追求也无法做到消灭对方的主要军事力量,相反它以消磨对方的战争意志为直接目标,进而赢得胜利。因此,实施这种战略的行为体往往刻意避免正面的大规模战斗,而以种种间接方式不断增加对方的损耗,最终迫使对方服从己方的意志。

不管是“对称战略”还是“不对称战略”,它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即如何使用既有的手段来“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但作为暴力运用方式,它们仍然存在着重要区别。对称战略的实质是把暴力限制和集中起来,从而使其规范化,而不对称战略则通常表现为一种无限使用暴力的趋势。本文认为,暴力无限化是弱者取胜的力量源泉。从历史的演化来看,战争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但又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势:暴力无限化趋势和暴力有限化趋势。战争暴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客观条件或被人们有意识地限制,这体现了国际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不过,从总的历史轨迹来看,战争暴力的主导趋势还是向着越来越剧烈的方向发展。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暴力无限化的逻辑并没有过时。早在19世纪克劳塞维茨就曾对此做过详细论述。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一旦战争走上以“打垮敌人”为目标(同时也就产生不被敌人所打垮的需要),就必然走向使用一切力量和手段,运用一切新发明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中,游击战最终将演变成全面的常规对抗。然而在当代不对称冲突中,不对称战略通常并不能发展成为战争反攻的准备阶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8页。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军事科学院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

李巨廉:《战争与和平》,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同上书,第44页。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下卷(军事科学院译),第15—16,46页。

武器的道路。只要人类之间仍存在无法以和平方式解决的矛盾,只要冲突和战争仍然关系到冲突各方或一方的核心利益,只要暴力对抗仍然以战争胜负作为最后的裁决,那么使用一切方法和手段来获取胜利仍将是冲突方必然的选择。正是这种“战争要素的自然倾向”,推动战争历史运动向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剧烈的无限化方向发展。不过,正如克劳塞维茨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这种逻辑经常需要“在现实中修正”。也就是说,现实中的冲突并不必然最终演化为无限制地使用一切暴力,冲突有可能通过妥协来解决,暴力的使用也经常被冲突各方有意识地加以限制。

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人类有时选择无限暴力,有时又愿意对暴力进行有意识地限制呢?本文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对“敌对关系”的认定。毛泽东曾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从本质上说,战争的意义就在于界定敌对关系,而决定战争暴力使用的也正是敌对关系。对敌对关系的不同认定会导致行为体在战争暴力上的不同选择,而敌对关系的认定常常取决于利益。如果为了核心利益(通常是生存所必需的利益)而战,那么冲突行为体会把对方视为“绝对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相应地,行为体在手段的选择上也不会施加任何的主观限制。如果为了次要利益(通常是除生存以外的利益)而战,那么冲突行为体就会把对方视为“有限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体的目的并不是将对方彻底消灭,而只需要通过某种暴力迫使之屈服即可。因此,行为体在手段的选择上也会施加一定的主观限制,表现在当代就是遵循广为接受的国际战争法或相关规则的约束。这里既有对目标与手段之间“对等原则”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报复与反报复行为的循环升级。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下卷(军事科学院译),第15—16页。

同上书,第16—18页。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多伊奇曾经把武装冲突分为“打到底的”冲突与“共存的”冲突。参见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4页。

当然,敌对关系也可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当强者做出实质性让步后(即承认并尊重弱者的核心利益),弱方对强者敌对关系的认定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从绝对的敌人变成有限的敌人甚至有可能成为朋友。

根据冲突双方对“敌对关系”的不同认定,我们可以把国际冲突大致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绝对的敌人——绝对的敌人”、“有限的敌人——有限的敌人”、“有限的敌人——绝对的敌人”。第一种类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罗马人犁翻迦太基人土地并在上面撒盐的做法,图密善皇帝“禁止纳萨莫尼斯人活下去”的诏令,成吉思汗对花刺子模帝国的大屠城等等。第二种类型则是近代以来欧洲国家间战争的常态。这种战争通常有明确的开始(宣战)与结束(缔约),参与军事冲突的通常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国家,而军事行动也基本遵守得到广泛认同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准则。尽管战场上厮杀的烈度不断加剧,但双方至少承认对方的主权国家地位。战败国家的生存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而且有希望重新进入国际体系。第三种类型则经常出现在本文所集中关注的不对称冲突中。

不对称冲突是物质实力悬殊的行为体之间的跨国武装冲突,因此冲突双方在手段的选择上严重不对称。除此以外,双方在目标或者利益诉求上也不对称。从当代导致以弱胜强结果的不对称冲突来看,这些冲突通常具有如下特征:强国到弱国的国土上作战,一般是为了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或是为了通过入侵扶持一个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傀儡政权,其目标是争取强权利益;而弱势一方通常是为了民族解放或者争取主权而斗争,其目标是为了生存。在手段与目标都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冲突双方对于敌对关系的判定就大相径庭,相应地它们对暴力方式的态度也有所相同。

从强者的角度来讲,它在不对称冲突中所追求的利益并不影响其生存,因此它面对的只是一场有限的冲突,不会视对方为绝对的敌人。这种关于敌对关系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强者对于暴力方式的态度与选择:既然是有限的目标,强者通常希望通过有限的暴力来实现。尽管强者通常拥有将暴力升级的能力与手段,但暴力的升级总会带来成本的上升。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暴力

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版,第504页。

阿姆斯特茨把这种战争称之为古典战争,参见 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olitics* (Boston: McGraw-Hill College, 1999), pp. 255—261。

卡普兰在其著名的“国际体系六模式”中归纳了“均势模式”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被打败的国家重新加入体系”。参阅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23页。

升级不一定划算。强者也希望冲突的对手同样只使用有限的暴力,因为弱者的拼死抵抗可能给强者造成巨大的负担。倘若强者像拿破仑所说的“必须作为游击队与游击队作战”,那将导致“恐怖与报复性恐怖出现螺旋式上升的怪圈”,从长远看仍然得不偿失。近现代战争史也表明,使用绝对手段的战争其战况总是空前惨烈且旷日持久,战争结局通常也是两败俱伤。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强者更倾向于为战争制订某种规则,以限制暴力的无限循环与升级。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其《万国公法》一书中曾写道:“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那就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这就是说,一切都应该符合于正规战争的要求。”事实上,对暴力的制约也是“不对称战略”的本质特征,在不对称冲突中,按照这种规则进行的战斗总是有利于强者。相应地,作为“常规”战争的既得利益者,强者总体上对战争规则的制订持积极态度。

从弱者的角度来看,不对称冲突的结果往往关系到它的生存,因此冲突在它看来通常是一种绝对的冲突。这种敌对关系至少从主观动机上使弱者在暴力的选择上更少限制。由于双方物质实力的巨大差距,遵循“规矩”进行对抗几乎肯定要招致失败。在生存利益的驱动下,弱者有很强的动机趋于使用一切可能的暴力方式。因为关系到核心利益,它们在暴力成本方面的忍耐力是巨大的(这种情况在越南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都有体现)。与强者主要关注“费效比”不同的是,弱者更多地关注能否取得胜利。只要某种战略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又在自身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弱者总是有强烈的使用动机。从当代不对称冲突的历史来看,这种战略或手段就是不对称战略,具体地说是游击战略以及冷战后逐渐成型的恐怖主义战略。这两种战略的共同特征是不遵守强者设定的“游戏规则”,将暴力的时间与空间无限地扩大:战时与平时、战场与居民区、士兵与平民这些传统的区别统统被超越。这种超越会给冲突双方带来巨大的成本,而当这种成本达到足够高的程度时,甚至强者最初所追求的胜利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作为一种暴力运用的方式,不对称战略自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的游击战肇始

参见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59、372页。
J. F. C. 富勒:《战争指导》,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5年版,第 7—10页。

以来,历经劳伦斯、毛泽东、武元甲、格瓦拉等人的发展与实践,已经成为具有系统理论与悠久经验传统的斗争形式,这为当代的弱势行为体运用这一战略提供了方便。其次,在全球化、信息化不断演进的当代,全球性的经济、信息、人员、技术联系远非过去所能比拟,而且由于知识经济的可复制性以及科学的发展,不对称冲突中的弱者在暴力选择时有了更多的现实可能性。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的本质区别在于对既有暴力使用规则的遵循或违反,“以弱胜强”的结果直接取决于冲突双方对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评估与权衡。冲突结果取决于采取不同战略行为体的成本考量。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市场上的买卖双方来加以形容:“确实只有在以下的情况下才能达成一致,即胜利者为达成政治目的而愿意付出的军事努力的程度,与失败者承认失败并接受较强一方要求的程度相一致。”取得胜利的进攻方可能获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但发现敌人不想接受关于失败的现实,而他已经付出了取得胜利所值得的全部努力;另一方面,保持了战争意志的弱者有能力通过不断升级暴力使强者的成本收益比失衡,进而迫使强者从政治上放弃战争。

(二) 两种战略的成本分析

战略是实现军事政治目标而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战争指导艺术的领域,再加上战略主体不可避免的情感因素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盲目冲动都会给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不过从长远的总趋势来看,由于现实利益的支配性作用,冲突行为体通常最终会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成本与规则是不对称冲突中战略互动的两个核心概念。正是从“理性人”的假定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对两种战略的成本控制问题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实施对称战略,强者的常规战争方式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现代工

参阅 *Asymmetric Warfare and Military Thought*,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_mla_apa_research_citation/0/6/9/1/2/pages69123/p69123-2.php

成本又可以分为“现实成本”与“预期成本”,有关论述可以参见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36—38.

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7 页。

业与信息技术为基础,在暴力规模的频谱上具有很大的选择能力;二是常规战争对现实的暴力选择往往施加了很强的限制,从而体现出客观能力与主观意愿之间的强烈反差。事实上,这一反差恰恰反映出强者在暴力成本控制上的两难处境:拥有有限目标的强者要在不对称冲突中胜利,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在于对己方成本与敌方成本进行有效地控制,即一方面使己方成本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并尽量降低,另一方面则力争使敌方的成本超出其忍受限度,但又不能因过于高昂而产生反效果,导致“两败俱伤”的不利结局。出于这种逻辑,现实的不对称冲突中就出现了强者不断提高暴力程度(比如做出违反现有战争法的行为)的同时又刻意为暴力制定某种限制(有时甚至不惜以单方面遵守来诱导对手)。当然,这种限制暴力的规则通常是由强者制订并有利于强者的,不过也反映出强者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理性考虑。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近代对称战略的发展本身发现人们对于成本控制的考虑。从历史上看,近代发生的传统战争多以对称战略的方式进行。这种战略方式能够保证战争暴力集中于战场,争端可通过速战速决的会战得到解决,从而使成本控制在可以忍耐的限度内。不过,人们很快发现,对称战略以及对称战争也逐渐变得无法控制和忍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使所有的参战国都清楚地认识到,它们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再一次经受住一场如此规模的战争,战争的发展甚至已经超出了受民族主义激励的民众所能承受的限度。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新的战略以某种方式大大地降低战争成本,否则进行战争将变得不再理性。

基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技术装备和消耗战的印象,人们发展了两种不同的对称战略:马奇诺防御学说以及闪电战进攻战略。马奇诺防御学说寄希望于防御能力的增强,使其固若金汤,无法突破,借此使战役成本分配趋于不对称化,即使进攻方的损失大到难以忍受的地步,而防御方的损失却减少到最低限度。不过事实证明,“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在德国集群坦克的攻击下完全没有发挥出预期的效用。与马奇诺学说完全相反,闪电战战略力图通过增强军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新战争》(章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00—104页。
同上书,第 183页。

队的攻击能力并同时缩小军队规模来避免持续时间较长的消耗战。

尽管这两种战略在细节上有很大区别,但它们的共同点是试图减少己方相对于对方的军力损耗,并力图控制相对战争成本,使战局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美国谋求建立反导系统的努力中看到马奇诺防御学说的影子,但从总体上看,“闪电战”成为对称战略在当代的典型形态。虽然海湾战争以后的军事革命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信息战”、“精确制导炸弹”、“空地一体战”等战争新名词,但这种强调以技术致胜的思想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对称战略”的窠臼:尽量控制战争成本,力争在战场上速战速决。英国学者马丁·肖(Martin Shaw)将当代西方的战争方式定义为“风险转移战争”,并归纳出15条规则,其思想核心同样突出了成本控制与速战速决的特点。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战争,西方国家现在也不太愿意卷入了。这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游击战乃至恐怖袭击,从而导致美欧军队无法发挥其在武器技术上的优势。因而,西方国家现在更愿意使用空军或导弹来控制其冲突成本。不过这样做的困境依然明显,在军靴尚未上岸以前,强者通常很难达成其政治目标。

与使用对称战略的强者一样,应用不对称战略的弱者同样面临着成本控制的问题,只不过在内容上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别。由于力量悬殊的既定格局,弱者倘若遵从常规战争的规则,几乎总是逃脱不掉现实主义的铁律:强胜弱败。因此,弱者对于“犯规”总是具有很强的动机。事实上,强者越是具有超强的实力,越是能够发动高出几个技术等级的现代战争,弱者在战略选择上的这种唯一性也就越突出。由于不对称战略趋于突破规则升级暴力的特征,有些人将使用这种战略的人视为疯狂或者非理性。不过,即使我们承认冲突中存在着“盲目的自然冲动”,但从总体上来看,弱者采取这种战略并非冲动的结果,而是理性权衡的结果。游击战略的理性逻辑已经被众多理论著述所详细阐释,恐怖活

William S. Lind, "Understanding Fourth Generation War",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4, p. 13.

Martin Shaw, *The New Western Way of War: Risk Transfer War and its Crisis in Iraq* (Polity Press, 2005), pp. 71—98.

Jeffrey Jarkowsky, "Boots on the Ground—Will U. S. Landpower be Decisive in Future Conflicts?" pp. 19—20, <http://www.smallwarsjournal.com/documents/jarkowsky.pdf>

动的产生、领导、组织、后勤保障、实施、后果预测以及处理与外部关系诸环节,也都符合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效率原则。克劳塞维茨早就指出,“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

如果我们承认弱者选择不对称战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那么这种战略是如何使弱者在“成本收益平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呢?从增加强者战争成本的角度来看,采取不对称战略的袭击者通常拥有两大战略优势。第一,袭击者的攻击目标和前进路线不确定。集中起来的袭击者有许多条攻击路线可供选择,并在实际上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选择进攻目标。即使像美国这样在技术、经济和军事上占有巨大优势的国家,也没有能力切实可靠地保护自己所有国民和机构的安全。“公开的恐怖活动是一个狭小空间,与之相关联的却是一个不安、恐惧和普遍猜疑的广大空间。”由于袭击目标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战略将分散防御方的力量,并为进攻方造成更多的袭击机会,从而能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第二,袭击者通常享有撤退的优势。不对称战略通常不以控制领土为目的,因此,他们可以在实现袭击目的后迅速撤退。而当双方使用相似的武器系统时,撤退相对于追击而言通常占据优势。在近代以前,袭击者可以通过砍倒树木、烧毁桥梁、派兵阻击或利用复杂地形等形式来摆脱追击;而在现代游击战或恐怖袭击中,不着制服的袭击者只要扔掉武器混迹于人群之中,就很难把他们与普通平民区分开来。现代自杀式袭击者甚至根本不考虑后路的问题,这无疑都有利于增加攻击的成功率。

此外,现代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还为这种袭击的效果起了“放大器”的作用。诺贝尔发明黄色炸药以后,一家无政府主义报纸曾写道:“一个带着炸弹的人,如果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使用它,可以抵得上一个团的士兵。……战争的整个方式已经因为科学发明而完全变革。”倘若弱者使用更致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将对强者造成毁灭性的灾难。除了武器以外,现代通讯与媒体同样为这种袭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今天日益通过全球范围的交易

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军事科学院译),第13页。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页。

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刘克俭、刘卫国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489页。

Michael J. Schaack, *Anarchy and Anarchists* (New York: Amo Press, 1977), pp. 87—88.

所来组织经济生活的社会而言,袭击有时能一下子就使交易所陷入惊惶失措之中,从而造成更为巨大的间接损失。由于这种放大效果,使得实力有限的基地组织获得了与当代唯一超级大国一较高低的机会。事实证明,弱者倘若能着力于不断发展出新的不对称战略手段,战争的局面往往会大为不同。

从弱者规避己方成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弱者由于在不对称冲突中有着更高的利益关切而具备更高的代价忍耐力,另一方面它也通过某些途径有效地降低了其成本与风险。不对称战略往往具有拖延、消耗与隐蔽的特点。拖延与消耗是由敌人的常规优势军队所决定的。由于弱者无法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它可以通过拖延时间和不断地给对方造成人员伤亡等损失来削弱其继续战斗的政治意愿。当然,拖延需要有较强的以空间、资源来换取时间的意志,因为这常常意味着将自己的国土置于对方优势火力的打击之下。不过对于立足于本土对抗外来占领军的不对称冲突来说,较高的民众支持能为这种拖延提供可能性。隐蔽或者混迹于当地百姓或地形中能够保护非正规武装,从而避免对方优势火力的灾难性打击。而且,这种隐蔽通常还会迫使强者在加大打击中增加“附带伤害”。在当代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这种“附带伤害”可能使强者陷入自我挫败的政治陷阱之中。

当代不对称冲突还有一个特点,即弱势一方往往是非国家行为体,这种身份使得强者通过加大打击力度来进行威慑的做法变得不可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区别在于国家有主权地位,有国家机器以及广泛的既得利益,而非国家行为体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无产者”。因此,国家相比于非国家行为体更容易被威慑,历史上许多国家宁愿承受失败的苦果也不采用不对称战略(比如拿破仑战争中的普鲁士以及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与此相反,非国家行为体的损益权衡往往是站在组织的立场上来进行的。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蚀本的情况,在军阀组织、内战各方和地方民兵的角度看来可能是有利可图的。此外,即便强者通过空中打击来作战,其效果也往往十分有限。如果一个国家历经数年战乱成为一片废墟,那么可供空中打击的目标就会很少。通常情况下,炸毁这些目标并不会给对方造成大的政治

参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新战争》(章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39—151页。

压力,而遭到攻击的一方则可以耐心地等待空袭自动停止。等到投入炸弹和导弹的材料价值远远超过摧毁目标的价值时,强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窘境:空中打击战略再也无法使用。

如前所述,“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升级暴力或者违反规则。相应地,能否达到“以弱胜强”的效果,则直接取决于两种战略互动所导致的冲突双方对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评估与权衡。就成本角度而言,不对称战略的确能使弱者在面对使用对称战略的强者时一定程度地平衡先天存在的巨大实力劣势,有时甚至能使弱者占据相当的优势,从而为其与强者的博弈留下比较宽广的空间。由于这一不确定的可能性空间,现实中的冲突往往并不是以某一方的灭亡为终点,而是倾向于回归到某个中点——一个符合“共存逻辑”的中点。在当代不对称冲突中,这种中点通常表现为强国承认弱者的主权或独立,或以撤退来结束对对方领土的占领状态。严格地说,强者往往并没有在军事上被击败,但由于冲突双方的实力差距过大以及人们对“强胜弱败”的强烈预期,所以这种“和局”常被人们看作是“弱者战胜了强者”。

四、伊拉克战争

2003年3月20日,美国领导下的联军发动了针对伊拉克的“倒萨战争”。这是一场双方实力十分悬殊的冲突,然而实力超强的美国却迄今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尽管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但从很多方面来讲美国都是失败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双方战略实施的角度加以分析。

二战后期英美等国一度成功应用的“战略轰炸”不再适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此。

即使是在公认的强者获胜的不对称冲突中,强者也往往最终需要做出某些政治让步来消弭矛盾的根源。比如在马来亚反英起义(1948—1957)中,英国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殖民当局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准许马来亚独立”,从而有效地离间了马来亚的两大种族——马来人与中国人。参见杰弗里·帕克:《剑桥战争史》(傅景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7页;Jay Gordon Simpson,“Not by Bombs Alone: Lessons from Malaya,”pp.91—98,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jfq_pubs/1622.pdf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考察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2006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首次承认美国没有赢得伊拉克战争。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6-12/22/content_5518547.htm。

（一）美国的战略实施

从3月20日起,美英联军以“斩首突击”的方式开始实施“伊拉克自由行动”,拉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5月1日,小布什总统在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正式宣布对伊主要战事结束。至此,美英等国联军在短短的43天内成功地打垮了伊拉克军队,完成了其“倒萨”的目的。不过,与第一阶段的骄人战绩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美军在第二阶段——“反暴阶段”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在布什总统宣布主要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各种反美力量开始聚集起来,并不断袭击美英联军。为了消除连续不断的袭击事件,联军仅在2003年就发动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针对联军和伊拉克官员、平民的袭击行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主要战事结束以来,美国领导的联军及伊拉克过渡政府与各派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一直以高度暴力的形式持续进行。美国的地面力量陷入了一场持久、复杂的反暴和教派冲突交织的战争,伊拉克反美力量正在耗尽美国军事优势的实质性部分。

美军在第一阶段的战果是辉煌的。美国在20多天的闪电进攻战中就消灭和击溃了40多万人的伊拉克正规军。伴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美国退役将军厄尔曼的“震慑与畏惧”理论也一时间名声大噪:“对于所有从事军事行动的西方政府而言,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在由选举决定的周期内有效地控制政治风险。”美国对此也不例外,其所有的战争计划都必须围绕一个目标,即争取迅速而决定性的胜利。强调在战场上“快速制敌”的“震慑与畏惧”理论,得到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欣赏,并成为此次伊拉克战争美军的军事战略指导。事实证明,“震慑与畏惧”理论的确能够迅速地取得军事胜利,特别适合于惩戒性军事打击和快速开辟战争通道。从本质上讲,“震慑与畏惧”是信息化时代的“闪电战”。它比二战时德国机械化闪电战优越的地方是依靠信息化的保障,推进速度更快,遭遇的抵抗更小,各种军事力量的配合和衔接也更好,因此直接的军事战果也更辉煌。不过,这些只是军事或战术意义上的进步。“震慑

李成刚:《伊拉克战争综述》,《军事历史》2007年第5期,第54页。

Martin Shaw, *the New Western Way of War: Risk Transfer War and Crisis in Iraq*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p. 106.

与畏惧理论和德国“闪电战”理论一样,都没有回答速胜后的占领该怎么办的问题。

美国在第二阶段“反暴”作战的失败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与美国军队多年以来形成的战略文化有关。战略文化是包括军事组织内在的信仰和态度的总和,它决定着关于如何使用军事力量的偏好。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战略文化的某些弱点体现得十分突出。首先,美国军队总是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于摧毁对方军队,而不是更为灵巧地使之服务于政治目的。“他们就像一个手里拿着锤子的年轻人,觉得一切问题都只是一枚钉子。”美国忽略政治维度的做法无疑不利于伊拉克问题的根本解决。其次,美国军队一直视自己为常规战争组织,因而极力排斥反暴作战。即使经历了越南战争的痛苦之后,军方仍然没有真正重视非常规作战。美国60多年来一直习惯于依靠高技术来赢得常规战争,这种“为昨天的战争(常规战争)而备战”的情况导致了伊拉克战争的两个阶段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美国学者并非没有发现这种脱节。但是,学者们的建议与分析并未受到五角大楼的欢迎。与其他大型官僚组织一样,五角大楼也始终偏好其喜欢做和善于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军方也会进行某些调适,但这种适应往往更多地关注于通过使用高技术来提高防护以及常规战斗能力,其前提实际上仍然是以为问题出在常规战争做得不够彻底。比如,美国副总统切尼坚持认为,只要美国能够扩大冲突,打击反叛者的后台伊朗和叙利亚,伊拉克战争的胜

参阅哈伦·厄尔曼、詹姆士·韦德等:《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滕建群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Robert M. Cassidy, "Winning the War of the Flea: Lessons from Guerrilla Warfare," *Militar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2004, p. 41.

Joseph S. Ny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Iraq,"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nye43>.

Bruce Hoffman,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June 2004, p. 16. http://www.rand.org/pubs/occasional_papers/2005/RAND_OP127.pdf

Jeffery Record,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Cultural Barriers to Successful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Analysis*, No. 577, September 1, 2006, pp. 9—10.

Brigadier Nigel Aylwin-Foster, "Changing the Army for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Military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005, p. 14.

利“就在眼前”。我们不能说美国军方毫无灵活性,但对于一个军事结构严重对应于常规战争的组织而言,要克服这种偏好需要对如何组织、装备、控制、训练美国军队的原则进行根本性变革。就目前的伊拉克战争来看,“美国远没有准备好,而且也缺乏相应的意愿和技能”。

(二) 反美武装的战略实施

伊拉克反美武装尽管组织繁多,但其总体实力远不能与美军相提并论。这些组织通常只能使用自制的路边炸弹、简易爆炸装置、冲锋枪、迫击炮、枪榴弹等轻武器,人数也只有几万,所能支配的资金更是有限。但真正令美军头疼的是反美武装的不对称战略。拉姆斯菲尔德承认,“主要作战行动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是非常明确的。但第二阶段进展得不够好或不够快,这也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坦率地说,想要控制没有人性的、从事暴力活动的极端分子,想要把我们的意愿强加给他们,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没有经验。他们没有陆军,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只是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发起袭击。”冷战结束以来,全世界都在谈论美国战场单向透明的武器威力,然而,现在美国也体验到了另一种“单向透明”。

对驻伊美军来说,伊拉克没有前线,但到处都是战场;伊拉克没有军队,但到处都是武装分子。伊拉克反美武装虽不是正规军,也没有类似当年越共那样得到外部大国的强力支援,但反美武装作为弱者有其独特的优势,他们敢于无所顾忌地使用任何手段、不计较任何伤亡及由此引发的后果。反观美军在军事行动中则患得患失,顾忌来自各种组织、法律以及道德上的种种限制,无法完全施展其强大军力。而一旦美军加大打击力度,往往会因为伤及平民而在政治上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总体来说,众多的伊拉克反美武装并不具有统一的战略纲领,不过从客观表现来看,其战略实施仍然存在着某些共性:一是通过使伊拉克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展示占领者的脆弱,即“越乱越好”;二是通过展示自己的勇敢以及激起美军的过度报复来争取对自己的支持;三是通过不断制造联军的

凯利·伊顿、安德鲁·韦德曼:《伊拉克战争与“布什原则”的命运》(任东来译),《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第55页。

Jeffery Record,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pp. 16—17.

随琳、王成龙:《伊拉克战争美军战略失误解析》,《国防科技》2007年第3期,第90页。

伤亡来消蚀美国的战争意志。简言之,决不能让世人觉得伊拉克的形势正变得越来越好。

伊拉克反美武装最初也曾应用正面对抗的战略,不过费卢杰和拉马迪等正面交锋死伤惨重的教训让他们转而实行“打了就跑”的城市游击战和恐怖袭击。一开始,反美武装往往近距离进行伏击或偷袭,也经常在美军的回击中被子击毙或俘获。后来,反美武装逐渐采取能隔开一定距离的遥控炸弹和迫击炮等武器来进行攻击。针对美军加强对自身目标防护的情况,反美武装转而更多地攻击“软目标”,不仅包括驻伊联军中其他国家的军队、伊拉克政府官员及其安全部队、电力石油管线,还包括联合国驻伊机构、亲美派兵国家的民间人士以及任何与美国合作的伊拉克人,甚至于还直接对海外目标发起攻击,沙特连环爆炸、伊斯坦布尔大爆炸、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事件都是明显的例子。

反美武装所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网络战”模式。网络战最早由约翰·阿奎那(John Arquilla)和戴维·龙菲尔德(David Ronfeldt)提出,具体指“小型组织相互交流协同,并以网络的方式从事战斗,彼此间没有明确的集中领导”。与传统的游击运动不同,伊拉克反美武装没有一个力量中心,没有明显的领导者,也不试图占据某些领土,并缺少单一、明确和统一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它没有可以辨识的等级组织。在一种疏松、模糊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组织彼此交换情报,交易武器,联合培训,协同袭击,在完成特定目标之后就分散开来,并可能再也不相互联系与合作。这种分散的、非中心的、高度自治的和机动的特点其实正是反美武装的生存之道,而信息技术、全球化和国际间人员流动的发展又为反美武装之间传递信息和建立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据相关消息,全球吉哈德和恐怖组织就曾经为伊拉克的反美组织提供了

Steven Metz and Raymond Millen, *Insurgency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p. 8. http://www.dni.gov/nic/PDF_GIF_2020_Support/2004_05_25_papers/insurgency.pdf

Paul Staniland, "Defeating Transnational Insurgencies: The Best Offense Is a Good Fe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No. 6, winter 2005, pp. 27—28.

John Arquilla et al., "Networks, Netwar, and Information-Age Terrorism," in Ian O. Lesser et al., *Countering the New Terrorism*, (Santa Monica, Calif.: The RAND Corporation, MR-989-AF, 1999), p. 47.

Bruce Hoffman,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June 2004, p. 16. http://www.rand.org/pubs/occasional_papers/2005/RAND_OP127.pdf

Steven Metz and Raymond Millen, *Insurgency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p. 4.

战术建议。这种网络战形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更加难以应对,以至于美国军方学者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将伊拉克战争称为一场“后现代暴乱”。从目前来看,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反美武装既不会被打败,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战争将像一团微燃的火焰长期地燃烧下去。

(三) 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理论解释

伊拉克战争自2003年发动以来,在经过第一阶段的短暂胜利之后,美国很快陷入了一场新的越战式泥沼之中,至今仍很难看到形势好转的趋向。2003年,美军死亡与伤残的人数分别为486人和2413人,此后四年每年的人数则分别高达800—900人和6000—8000人,2007年更是成为美军自开战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年。从国内外的媒体及学术文章来看,除了布什等少数人一直坚信“形势正在好转,正在取得胜利”以外,几乎所有的声音都认为美国失败了或者无法取得胜利。对于这样一种状况,既有的不对称冲突理论是否能够合理地进行解释呢?

安德鲁·迈克的“利益不对称”理论认为,“相对实力”决定了“相对利益”,“相对利益”导致双方政治脆弱性的不同并决定冲突的结局。就伊拉克一方来看,这场冲突无疑关乎其核心利益。萨达姆的政权被推翻,他本人也于2006年12月30日被处以绞刑。从2003年3月美英联军侵入伊拉克到2006年6月间,伊拉克大约有65万人死于非命。局势的动荡还造成大批伊拉克人无家可归,据估计有160万人流亡国外,伊拉克政府估计每月有5万人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然而,“利益不对称”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美国的相对利益。

Jim Krane, “Iraqi Insurgents Use Tactics They Learned from Chechens, Taliban, AlQaida,” *AmyTimes.com*, January 5, 2004.

Bruce Hoffman,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p. 18.

Ibid., p. 20.

<http://icasualties.org/>.

本案例只考察迄止2007年年底以来的冲突状况,就这一段时间而言,美国在伊拉克总体上是失败的。当然,伊拉克战争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从新闻报道中也不时能听到一些形势或好转、或恶化的相关报道。我们无法断言这场战争最终以何种面貌结束,不过从当代类似的战争来看,这场战争无疑仍将持续很长时间,美国也必将继续为此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pp. 195—200.

<http://www.iraqanalysis.org/mortality/432#faq1535>.

一方面,伊拉克具有非同寻常的丰富石油资源;另一方面,伊拉克地处阿拉伯世界中心,踞守海湾能源通道,是美国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渗透的理想前进基地。此外,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撤出,无疑将助长极端伊斯兰分子和基地等恐怖组织的气势,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海湾国家)则会质疑美国保护伞的可靠性。美国决策者在面临强大撤兵压力下仍然一意坚持,反映出美国在这一地区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不过,这并不能带来美国的胜利。

吉尔·米洛姆的“民主政体论”是专门用来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在小型战争中落败”的理论。他认为,由于具有参政能力的国内民众的阻止,这才导致了强国的失败。不过,从伊拉克战争的情况来看,“民主政体论”的解释至少在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任何时候要进行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尤其被迫朝着承认失败的方向调整,都将是非常艰难的漫长过程。更何况,伊拉克问题已经成为布什总统的最大外交遗产,其成败与否直接决定着对布什的历史评价。因此,小布什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美国在伊拉克已经失败”的事实。就民主党而言,尽管可以通过宪法赋予国会的“钱袋权”来结束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但从2008年总统大选的角度来看,民主党人必须避免再次被抹黑为逃跑和反恐懦夫的危险。此外,由于很多民主党人过去支持了战争,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提出可信的替代政策,客观上使他们无法真正有效地反对布什政府的战争政策。相反,2007年的增兵使驻伊美军达到了创纪录的16.5万人。

杰弗里·内科德的“外援论”同样无法对伊拉克战争做出合理的解释。从反美武装资金来源看,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萨达姆时期的存款,二是外来势力的支持,三是绑架或其他犯罪所得。事实上,反美武装使用的装备很廉价,重新补给所需费用十分有限。从武器来源看,伊拉克本身仅公开的军火库就达1万多个,总储存的弹药量高达120余万吨。伊战前,伊拉克军队把许多适用于游击战的武器分散贮藏在学校、清真寺和村落礼堂等地方,并给民众分发了700万支步枪。从美国一直指责的“外来势力”(包括在伊拉克的基地组织以及与叙利亚和伊朗有联系的外国圣战者)来看,“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确切

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p. 15.

Robert Pape, "Coercive Air Power in the Vietnam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 2 Autumn 1990, pp. 126—129.

《规模庞大超过美军,伊拉克有一万个军火库》,《环球时报》2004年10月29日,第十版。

的,但与伊拉克本土的反抗者相比,他们的人数很少。比起从萨达姆的军火库中劫掠来的武器,来自叙利亚和伊朗的武器是第二位的。”另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2007年 2月 2日公布的一份评估报告称,目前伊拉克人之间的暴力活动已取代“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

相比较而言,托夫特的“战略互动论”比较符合伊拉克战争的现实。在战争的“倒萨”阶段,运用“闪击战”的美国军队仅用 43天就成功地击败了采取常规手段抵抗的萨达姆军队。但在战争的反暴阶段,习惯于常规战争的美国军队始终无法有效地遏制反美武装的袭击。尽管美国军队也不时爆出杀害平民以及虐待囚犯等丑闻,但惧于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和强大的国际舆论,美国并没有在战略层面上应用“野蛮战略”,美国的失败的确与托夫特关于战略互动的假设相符。不过,托夫特没有深入说明其中的逻辑机制,更多地只是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现象,即“决绝的暴乱分子是很难被打败的。……毫无节制且单纯地应用军事力量不仅很少能赢得战争,而且绝无可能赢得和平。”

通过对伊拉克战争的具体考察,不难发现美国的根本困境在于它无法有效地控制其战争成本。一方面,伊拉克反美武装不按常理“出牌”。除非迫不得已,他们根本不与美军发生正面对抗。相反,他们通过路边炸弹、汽车炸弹、迫击炮、狙击枪、偷袭、绑架、甚至人体炸弹不断地袭击美军及其合作者。此外,反美武装还不断对基础设施进行破坏,以至于水站、油管等设施的修复和维护赶不上破坏的节奏。由于绑架、杀戮横行,政治经济重建也步履维艰。正如布鲁斯·霍夫曼所言:“暴乱者最关键的是要剥夺民众的安全感。通过暴力与流血,暴乱者试图营造一种恐怖气氛,以此来昭示政府在维护安全方面的无能及脆弱。”

另一方面,数量有限的美军始终无法有效地控制伊拉克领土。按照以往的

凯利·伊顿,安德鲁·韦德曼:《伊拉克战争与“布什原则”的命运》,第 51页。

<http://news.nen.com.cn/72341298102665216/20070322/2182654.shtml>

事实上,美国也认识到“野蛮主义”不会成为成功的战略,这一方面是因为无法将之贯彻到极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族自治”的理念激励了民众的抵抗。参见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p. 227.

Ibid., pp. 226—227.

Bruce Hoffman, *Insurgency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Iraq*, June 2004, p. 15, http://www.rand.org/pubs/occasional_papers/2005/RAND_OP127.pdf

经验,仅控制游击队的抵抗,军队与游击队的数量比例就需要达到 20:1,更不用说击败游击队了。“即使在已经控制伊拉克的情况下,美国依然需要两百万人控制局面。”这对于高度技术化的美军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除此以外,倘若动用武力的目标是为了对某一地区进行长时期的控制和有效的建设,那么军队的作用往往是不够的,有时甚至还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军对武力的过分依赖以及伊拉克重建的乏力,使它无法赢得伊拉克民众的认同。这种态度进一步降低了美军的兵力空间比,使其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或许还是基辛格的名言最能揭示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游击队只要不输就是胜利,传统强权只要不赢就会失败。”

五、结 论

本文主要是从战略视角来考察当代不对称冲突以及“弱者战胜强者”的现象。在当代不对称冲突中,一方面由于不对称冲突对于弱者而言通常关乎其核心利益,因此弱者往往会在暴力手段的使用上趋于无限化;另一方面,弱势一方日益非国家化、网络化的特征,再加上当代全球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弱者具备通过不对称战略取胜的可能性。在一场无休止的暴乱与反暴乱战争中,看不到胜利曙光的强国往往会因为成本高昂而不得不最终放弃战争。从总体上看,由于不对称战略的运用在当代不对称冲突中日益成熟和普及,也由于使用这种战略的弱者在冲突的成本控制方面相比于强者往往具有一定优势,因此,当代的不对称冲突才越来越呈现出“弱者战胜强者”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不对称战略和暴力无限化是弱者取胜的力量源泉。

根据前面的数据与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可以用“不对称战略”来解释“弱者战胜强者”的现象,弱者如果采取不对称战略并显著提高强者的“费效比”,就能打击强者的战争意志,从而取得不对称冲突的胜利。从理论上说,这一结论对于破除现实主义的“实力决定论”无疑是有利的。“实力”无疑是十分有用的

亨利·C·K·刘:《伊拉克战争与超级大国的终结》(林贤剑译),《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期,第65页。

Hannah Allam, "Outlook Is Bleak For Success In Iraq," *Philadelphia Inquirer*, May 9, 2004, p. 1.
Henry Kissinger, "The Vietnam Negotiations,"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69, p. 214.

理论概念,但在当代的不对称冲突中,弱者可以通过采取“不对称战略”来扭转不利的局势。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只是从军事战略的视角来进行探讨,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其他因素的解释力。事实上,现实中的每场不对称冲突都是不同的,在某种冲突中的成功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场冲突,不对称战略的兴盛也并不就意味着强者必然失败。它只是表明,在当代条件下,由于弱者在适应性方面的相对优势,强者在成本控制方面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由于本研究揭示了当代不对称冲突中的某种共性和趋势,因此它对于相关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弱者而言,它有助于加强战争的信心和明确努力的方向;对于强者来说,它也可以使其预先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有更切合实际的估计,警醒其不要轻易言战。